

評〈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

黃庭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的終極關懷是社會秩序如何建立的課題；然而也許因為社會學者都是文人，他們不太意識到戰爭——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發生、而且對社會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情——的存在。儘管韋伯 (Max Weber)、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及阿爾道塞 (Louis Althusser) 等社會學大師一再強調暴力是社會權力的基礎、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後防線，然而社會學者都只願意投入心力研究意識型態、社會分工、利益交換、以及人們的常識假設等因素如何協助延續既有的權力關係，但卻極少探討軍事力量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作為分支的教育社會學比母體的社會學患有更嚴重的「去軍事化」及「去戰爭化」弊病。也許因為學科發展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承平年代的美國、英國及法國等西方社會，教育社會學者對戰爭及軍事因素視而不見，他們完全忽略戰爭對學校教育的衝擊、學校體制如何影響「文人」及「武人」的權力分配、及軍事衝突如何左右不同階層及族群的社會流動機會等等重要的課題。¹

因為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重文輕武」的偏差，黃金麟教授〈戰爭與台灣高等教育，1945-1990〉一文的重要性便顯得異常突出。黃教授試圖把戰爭從新引導回社會學的討論，他以台灣戰後高等教育為案例，指出過往的學者都只以「政權生存」及「經濟發展」解釋戰後台灣大學教育的演變，完全無視戰爭的作用——或者只是把戰爭看成是

DOI: 10.6676/TS.201712_34.0006

1 當然，二次大戰後美、英、法等西方國家並非沒有發動或介入軍事衝突，然而它們參與的戰爭都是在海外開打，學者們不容易感覺到戰爭對他們身處的社會的影響。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及阿普爾 (Michael W. Apple) 等西方教育社會學大師的經典作品都完全無視戰爭的因素 (黃庭康 2017)。

可以一筆帶過的背景因素。因為戰爭具有生產性、方向性、目的性和限制性，它會影響大學系統的建立與發展，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必須放在 1945 年後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的軍事緊張與冷戰來觀看才不會漏失」。黃教授以詳細的歷史論述闡釋他的論點：以戰後第一波高教擴張為例，台灣在 1950 年只有國立台灣大學一所大學及師院、工學院、農學院等數所學院；但隨後掌權者以新設或復校方式在短短十多年間陸續成立了六所公立大學及學院以及十二所私立院校，加上原有三所改名與改制大學，總校數快速增加為二十一所大學及獨立學院。除了數量激增外，這時期還出現軍警官學校大學化及數所教會大學的創立。黃教授認為這些趨勢都與戰爭有關：因為與對岸處軍事緊張狀態，加上要準備「反攻大陸」，統治者需提高軍警人員的素質，因此推行軍警校大學化；因為「共匪」取得政權後打壓基督教及天主教，西方教會被迫把學校遷出中國大陸，急於爭取西方國家支持的國民黨掌權者順理成章的讓教會在「自由中國」繼續未竟的教育事業。另外，因為與共產黨隔岸繼續「還未有完結的內戰」，國民黨為了防止「共匪」滲透以及確保高教為反攻大業服務而牢牢的掌控大學。國共軍事緊張的限制性導致戒嚴時期台灣高等教育幾乎全無自主性可言。

黃教授又指出冷戰的格局對戰後台灣高教發展也帶來深遠影響。韓戰爆發後美國派出第七艦隊游戈於台灣海峽，台灣偏安之局面於焉形成，之後島上多所高教院校在美援支持下蓬勃發展。到了 1960 年代，受美國主導的台灣高等教育更緊密的配合經濟發展策略。美國政府及亞洲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等民間組織又積極投入資源促進與台灣的學術聯繫。西方陣營與共產集團的對立間接推動了台灣高教的發展，但同時亦導致台灣在學術上依賴美國。黃教授精簡扼要的歷史論述有助讀者掌握戰後數十年戰爭因素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影響。

〈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對戰後台灣高教發展提出了有意義的觀察，幫助我們更平衡的看待歷史以及挖掘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比方說，筆者研究戰後台灣教育，發現 1950 年代

華盛頓通過美援投入大量資源支持台大、成大及師大的發展。美國支持的項目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及具實用性的學科——當時美援主要以「科學教育計畫」、「醫學教育計畫」、「工程科學計畫」及「農業科學計畫」項目資助台大；支持師大的最主要項目是「工業教育計畫」（目的是培養技職院校的師資），相對之下政治大學拿到的金額甚少。² 歷史資料導致筆者深信美國的策略是要藉把台灣發展成一個經濟發達、人民無虞溫飽、由技術官僚主導——而不是一個政治掛帥，被一天到晚喊著反共口號、搞意識型態工作的政治力量主導——的社會而達到圍堵共產主義的目的。從這個觀點出發，筆者一直認定不以自然科學及科技見長的政治大學在美國眼中毫不重要、華盛頓並沒有試圖利用政大達到戰略的目的。然而，黃教授在文章註三指出，政治大學是「政府高級官員的培養場所，美國很清楚它的利益必須透過台灣的精英來落實」，因此華盛頓曾透過不同管道對該校的外交、大眾傳播及 MBA 計畫給予合作支持。黃教授明確指出政大亦是美國反共策略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華盛頓在扶植有助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的同時其實並沒有忽視關於政治、管理、及影響人們意識型態的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他的講法提醒筆者不能夠單從經費投入金額多寡判斷美國的策略、所需金額較少的援助項目不代表戰略價值不重要。

另外，〈戰爭與台灣高等教育〉一文亦對 1945 年後台灣教育的發展趨勢提出了很多極有意思、可以發展成研究課題的觀察。比方說，文中第一個部分「連鎖之變」指出基督教及天主教教會背景的大學是戒嚴時期唯一以宗教名義設立的大學；一直到 1990 年才開始有佛教及道教團體創辦大學。相較於東吳、東海及輔仁等大學的創辦及在台復校，佛教及道教團體晚了數十年才開始參與營辦大學。誠如黃教授所言，不同背景宗教團體進入高教場域的這時間落差是一個非常值得評估及考察的課題。另外，文中「冷戰的出路」末段部分指出經

2 美國資助台灣院校的另一個重要項目是「僑生計畫」，目的是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港澳及東南亞華僑青年學生，避免他們跑到「赤色中國」升學（黃庭康 2016；Wong 2016）。

過了 1950、60 年代的第一波高教擴張後，台灣高等教育的增長開始放緩——從 1965 年到 1986 年解嚴前夕大專院校只從 21 所增到 28 所。這是黃教授對台灣教育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且有趣的觀察。為什麼台灣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進入了高等教育的「低度成長期」？是因為台灣經濟起飛，加上對岸的中國大陸經歷文革等政治災難後處於千瘡百孔的狀態，根本對台灣不再構成軍事及其他方面的威脅，因此國民黨掌權者可以放慢大學教育發展的步伐？另外，1970 年代開始台北在外交上節節敗退，之後華盛頓與北京建交，台灣在國際上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危機。為什麼在外交上越來越孤立，必須更「莊敬自強」的中華民國政府可以在高教政策上做到「處變不驚」，沒有以另一波的高教改革鞏固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以及強化台灣在更嚴峻的國際政治環境的生存能力？這也許是另一個可以以黃教授的觀察為立足點發展的研究課題。

如果要對〈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提出批評意見，我大概可以從概念、歷史論述、及資料三方面提出一點看法。首先，筆者認為該文「戰爭」一詞必須進一步概念化及精緻化。因為「戰爭」只是一個日常用語，而並非嚴謹的社會科學概念。它涵蓋著多種發生在不同歷史社會情境、激烈程度差別甚大的軍事緊張及衝突。如果我們沒有藉比較研究把它概念化及建立「類型學」(typologies)，「戰爭」的概念將不具太高的分析價值，也無助於解釋二次大戰後台灣所處的特殊戰爭狀態如何具體地形塑高等教育的面貌。舉例說，戰後台灣儘管與對岸處軍事緊張的狀態，但因為美國的保護，台灣不太可能與中共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另外，在華盛頓的制約下，台灣只能發展防衛性的軍事力量。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台灣戰爭的生產性、方向性、目的性及限制性，也間接左右了高教的科研、軍事研發、及軍事學校的規模等。因為台灣「戰爭」的特殊性，它所處的軍事緊張關係對高等教育的影響一定跟美國、蘇聯、中國大陸等軍事衝突的「龍頭」國家非常不一樣。

此外，也許為了突顯「戰爭」的影響力，〈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

育〉一文的歷史論述只注意到國共及美、蘇兩大集團之間的軍事衝突，忽略了其他的矛盾關係，彷彿華盛頓、國民黨掌權者及各高等院校等在反共的大前提下形成高度協調的統一戰線。然而，因為冷戰發展出來的聯盟其實內部充滿了矛盾。比方說，1950年代初期美國認為中華民國軍隊的最大問題是軍人文化水平低、缺乏軍事專業性，加上軍人只知效忠個別將領，形成軍隊內部派系林立。韓戰爆發後，美國軍事援助台灣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目的是要把軍隊現代化、提高軍人的知識水平及專業性、打造服從類似韋伯所講的「理性科層權威」(legal rational authority)——而不是效忠個別將領——的軍事力量。³ 然而，蔣介石——中華民國最有權力的軍事領袖——的想法卻不一樣。他一直認為軍人最重要的是對領袖的忠誠，並堅信軍事教育的核心就是精神教育，軍隊專業化及現代化對他而言都是次要的。即使到了1950年代後期、甚至1960年代他這想法仍沒有太大改變。因為把政治的忠誠放在首位，蔣介石多次公開呼籲國防部投入更多資源向軍校學生進行政治及思想教育，同時又積極發展政工幹部學校，並在軍中安插大量政工人員監控軍人的思想及行爲。蔣介石的做法招惹美國軍事顧問團的不滿（石永貴 2013）。⁴

另外，我們研究冷戰對台灣高教的影響時也必須注意西方背景的院校及人員與國民黨當局的衝突，不可低估反共陣營的內部矛盾。筆者茲舉二例說明這一點。首先，誠如黃教授所言，1949年後基督教及天主教教會把部分教育事業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然而國民黨掌權者絕對並非如文中所言般毫無保留的歡迎西方宗教背景的院校。因為從1920年代北伐成功後開始，國民黨一直認為西方教會在中國辦學是侵犯了中國政府的教育主權，他們又抱怨教會學校沒有配合政府向

3 195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國防部在軍中舉辦文化測驗淘汰低知識水平的軍人，1954年該部成功爭取到把軍事學校的軍官養成教育改為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1956年及1957年軍事學校以落實「文武合一」為理由而與大專院校合辦聯合招生。筆者估計這一系列政策都跟美國試圖把中華民國軍隊現代化有關。

4 蔣介石把軍人的忠誠放在首位，有部分原因是大批國民黨軍人在國共內戰後期叛變投共，導致他非常缺乏安全感。

學生灌輸對黨國的認同。國民政府一直試圖以行政力量掌控教會學校。然而因為內憂外患的緣故，大陸時期國民黨「收回教權」的計畫始終成效有限（Bays and Widmer 2009; 楊思信、郭淑蘭 2010; 楊翠華 1978）。因為這些背景因素，播遷來台後國民黨掌權者很小心要避免學校被外來勢力掌控，以免重蹈在大陸的覆轍。筆者從歷史資料發現 1950 年代初期當美國的基督教會提出要在台灣開辦大學時，台北當局反應非常有保留、非常審慎，中華民國政府絕非如文中所言般把它看成是「天上賜予的禮物」。最後，經過了冗長的談判，「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同意台北當局開出的條件——包括不得以外國人擔任校長，教學課程必須經中華民國教育部同意，學校必須跟其他學校一樣設立教官、開設教育部規定的必修課（包括「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及軍訓課等——東海大學才得以創辦。

黃教授在文中註三又提到美國在政大復校後支持發展該校的新聞傳播系。其實美國在二次大戰時就曾經通過援華計畫幫助中華民國強化新聞專業。然而，根據歷史記載，當時被派到中國協助培訓新聞工作者的美國新聞專業人士都驚覺中國政府只把媒體當成是黨的喉舌，國民黨一直踐踏新聞自由，完全不尊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許多美國派來的人員都在派駐期滿前離開，與國民黨不歡而散（Fairbank 2007: 67-72）。在 1950 年代台灣政治大學的「黨校」色彩甚濃，很難想像來自美國的新聞專業人員可以與該校新聞傳播系合作愉快。

最後，筆者認為〈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應該更多運用第一手的歷史材料作為立論的根據。因為該文要探討的不單是一個社會學的課題，它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歷史課題自然需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及材料作處理。筆者最近研究 1950、60 年代台灣軍事教育，發現國防部的「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國史館、教育部等有極多關於戰後台灣軍事發展的珍貴檔案資料可供參考。此外，學者們也可以從網上的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資料庫找到甚多美國外交部及國防部等的檔案資料，藉以了解華盛頓就台灣軍事形勢的戰略思維及部署。善用一手歷史材料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的在黃教授的基礎

上繼續探索軍事衝突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把戰爭因素納入成爲我們社會學想像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 石永貴，2013，〈蔣經國與美顧問團激辯軍中政工制度〉。《傳記文學》102(3): 4-8。
- 黃庭康，2016，〈反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 50 年代爲例〉。頁 83-116，收入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庭康，2017，《批判教育社會學九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楊思信、郭淑蘭，2010，《教育與國權：1920 年代中國收回教育權運動研究》。北京：光明日報。
- 楊翠華，1978，《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1922-193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ys, Daniel H. and Ellen Widmer, eds. 2009.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irbank, Wilma. 2005.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 Wong, Ting-hong. 2016. "College 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6(2): 331-357.